

热历史

管仲与他的富国策略

□戚风

提起齐鲁文化，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最有影响的儒家文化。其实，多年来大家忽视了齐鲁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发端于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市场经济思想。

首创盐铁专卖制度

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官山海”在管仲之后备受各朝重视，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千余年间，盐课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食盐专卖制度的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最早倡导专业分工

齐国制造业之发达，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可以为证，该书主要记载的就是齐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情况。

管仲富国策之二正是齐国制造业赖以兴旺发达的“专业分工”制度。《管子·小匡》中管仲与齐桓公关于“四民分业”的一段问答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也奠定了齐国争霸春秋的国力基础，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管仲将齐国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明确规定，四者分类集中居住，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且不能自由迁徙。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世袭可以积累经验。人民一经分工，则士农工商分别“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这就是说，同行业的人聚集一起，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以齐国的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纺织中心，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临淄。当时，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



▲管仲雕像（资料图）

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对分工带来的贫富差别，管仲特别关注，特意制定颁布多项抑富扶贫措施，其中包括下令不准富豪之家从事手工编织和种菜之类的工作，以确保此类从业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不受冲击。

优惠政策刺激商贸

管仲富国策之三，当推重视国际贸易和商业流通。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做足了文章，极具特色。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

齐国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承诺凡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与当今我国各地注重招商引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管仲将外商货物多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奢侈消费拉动内需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这可列为其富国策之四。

管仲任齐国相国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但司马迁著《管晏列传》时却说，尽管管仲比国君都富裕，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管仲奢侈。

究其根本，在于管仲倡导的奢侈消费观念。管仲奢侈的生活不过

是他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理念做出表率罢了。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由此可见，管仲认为修筑华丽的台榭楼阁是调整经济的一项对策。《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管子·侈靡》篇更是将管仲的奢侈消费论推到极致，他建议“鸡蛋要在上面画上图案再煮了吃，柴火要先雕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用以烧火”。

实际上，管仲对消费问题有不同于传统节俭观点的独到分析。他的真实主张是奢侈并重，即不一味强调节用，也明确提出“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

妙用“无形之手”调控

齐国西部某年因涝灾发生饥荒，粮食短缺，粮价上涨，每釜达百钱；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每釜仅十钱。

两地价格不同，管仲据此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但要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

这样，东部齐民要缴三釜，而西部齐民只缴三分之一釜，东部的粮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齐国政府手里。政府将粮食平价散售于齐西之后，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最终使“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管仲深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这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巧妙地利用“价格”完成了一次事关社稷并颇为棘手的宏观调控。

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奠定齐国富国强兵的基础，管仲富国策之五可总结为将国家宏观政策与市场价格巧妙结合的宏观调控艺术。

经济战降服邻国

鲁梁两国的老百姓喜欢织一种既厚又平滑的绸子“缁”。管仲就劝说齐桓公穿缁，并命令大臣穿缁，如此引领百姓也都穿缁，于是齐国的缁价格大涨。鲁梁两国的国君见有利可图，就要求举国织缁。所有百姓都织缁，农业生产因此荒弃。

一年之后，管仲见时机成熟就劝齐桓公改穿帛，命令举国不许穿缁，同时闭关锁国，既不许进口缁也不许出口粮食给鲁梁两国。

鲁梁两国很快闹起饥荒，有钱买不到粮，农业荒弃已久短时间难以恢复，饥饿难耐的国民十之有六归顺齐国。

短短三年，管仲通过经济战降服了鲁梁两个国家，这就是管仲“服帛降鲁梁”的故事。如是还有买鹿制楚、买狐降代等。

上至君王，下至黎民，举国设“局”，管仲“经济战”运用之妙可谓其富国策之六。（《上海法治报》）

史海钩沉

古代如何用民意反腐

□李宪堂

群众监督是防治各种腐败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方面古人很早就进行了各种尝试。据记载，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有了考察民意、征集舆情的制度和设施：“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政有缺失，民得书于木。”

西汉时政府设立专门访察民意舆情的“风俗使”。据记载，汉宣帝时曾遣使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

两晋时期的“风闻言事”也是利用舆情纠举官员不法行为的一种机制。“风闻言事”也称“风闻奏事”“风闻弹人”“风闻访知”等，即监察人员无须持有真凭实据，只要依传闻便可立案纠劾。

西汉时期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举报箱”，称为“匭筒”，是汉宣帝时的名臣赵广汉创立。“匭筒”是一个类似于瓶子的竹筒，上面有小孔，可入不可出，用于收集各种投诉与检举密信。唐朝时期，又发明了“铜匭”，是一个方形铜匣，类似于今天的意见箱。

（《老年生活报》）

生活史

古人的“共享”很超前

□王文

“共享经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其实早在汉代，古人就已经有了“共享”的理念。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在当皇帝之前，就曾与朋友合资养驴来出租。当了皇帝后，刘秀专门出台政策，鼓励老百姓将驴出租。

刘秀还让百姓在驴身上用烙铁烙出花色各异的图案，作为驴的“身份证”。而后，他又推出“簿籍制度”，要求所有供出租的牲畜都要注册登记，从而一举规范了汉代的“共享交通”。

到了南宋，人们推出了升级版“共享车”，当时叫“街车”或“长车”，其外部一般用绸幔装饰，车顶有盖，可以容纳6个人同时乘坐。使用“长车”，通常分为按时段收费与按天收费两种模式，客户往往都是那些有钱人家出门游乐的公子和小姐。

收入一般的中产阶级使用的“共享车”则是一种用毛毡做篷的毡车。比如，《婚礼新编校注》中就记载了人们用毡车迎亲的场面。不过，古代的毡车没有减震系统，新娘这一路颠簸过来，怕是都要晕车了。于是，“共享轿”应运而生。炎热的夏天，“共享轿”就以“凉轿”为主，到了冬天则以“暖轿”为主，可以说是相当人性化了。除了“共享轿”，古代的“共享船”也十分流行。唐代的“共享船”业务就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就连大诗人白居易也凑热闹租“共享船”游了一次西湖，留下了“谁留使君饮，红烛在舟中”的诗句。

除了上述项目，古人还会共享园林（私人园林对外开放）、共享图书（书籍租赁）、共享农具……

（《大同晚报》）

文史拾零

古代西域驿站

□张允 王慧霞

汉代，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为过往使者商旅提供保障。商人群体是民间贸易的主力军。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生动描绘了运载丝绸货物的骆驼商队穿越沙漠，到西域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景。使者除了承担政治使命，也会私下进行民间贸易。商人、使者跨区域流动，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互动。

在中原与西域的民间贸易中，丝织品贸易最为常见，古代西域各国所拥有的丝绸除自用外，剩余部分通过驿站等进行转手贸易。

茶叶贸易也较为常见，清代方士淦《东归日记》记载：“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

牲畜贸易主要是牲畜以及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与茶叶、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通过古代西域驿站前往中原进行贸易的各民族，带来牲畜以及各种皮货，带回粮食、纺织品等中原特产。

清代，许多驿站附近出现了小型集贸市场，有的驿站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贸城镇。以古代西域驿站为载体开展的民间贸易活动，推动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互补与经济生活的共同发展。（《中国民族报》）